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困境及其出路

Problems in the Studies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and Their Solutions

田敬诚

(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司 北京 100816)

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正面临经济大潮的强烈冲击,困难重重。

困境之一: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耐不住书斋里的清贫与寂寞,纷纷下海。即使摸不到大鱼,经济收入也远高于高校和科研机构。走的人得意洋洋,未走的人心绪惶惶。精神生产同物质生产一样,高素质的生产者的高质量产品的关键。没有高水平的研究人员,哪来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但是,目前人们普遍重视物质生产而轻视精神生产。一位研究国际金融的大学副教授说,如果他到外面的公司去干,收入是在学校里的 20 倍。在这种情况下,从事科研几乎成了“愚人的事业”。

困境之二:有了高水平的研究人员,尚须具备经费、信息、资料等必要的物质条件。据统计,全国高校 1992 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总数为 13 753 项,投入经费 3 946.9 万元,投入人数为 21 236(人年),每个项目的平均科研经费仅 2 870 元,每位研究人员平均仅 1 858 元。目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大多要求研究现实问题,需要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而调研费用就是一大笔开销。不过,这还不是最花钱的,开支最大的是出版补贴。有一位教授,一个研究项目的经费 10 000 元,写出一本 20 万字的书稿,找到出版社,出版社张口就要 12 000 元出版补贴,把所有经费都填进去还不够。另外,研究资料和信息缺乏也是一大问题。没有大量最新的信息无法进行高水平的研究。但目前国内书价昂贵,更不用说用外汇购买国外书籍杂志了。

困境之三:有人说,不管怎样,高校和科研机构还是集中着一大批优秀人才,国家再困难,每年还是投入了几千万元,可怎么没见出多少有影响、有定评的著作和文章? 这又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即人文、社会科学除了有人、有钱外,还要求有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良好的学术环境是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很好的概括,它符合科学研究的特征及规律。自然科学要求自由探索,而且越是前沿

性的基础理论研究越是如此,人文、社会科学同样是科学,为什么就不许自由探索呢? 一部中外古今的科学史证明,真理是通过争鸣发展的,没有争鸣,科学研究就停止了,灭亡了。马克思说:“最好是把真理比作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放射的光辉便越灿烂。”所以争鸣没有错,争得面红耳赤不可怕,怕的是万马齐喑、一片死寂。

困境之四:给钱、给环境之后就一定能产生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吗? 仍不一定。因为我们的现行体制有毛病。知识分子被圈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深宅大院里,不了解社会实际运行情况,没有参与实践的机会。一位学者,如果他只了解理论,只了解历史,只了解国外,但不了解中国实际,那么他仍然难以写出对现实有巨大影响的著作。由于体制上的原因,知识分子对社会实践的了解仅限于道听途说、缺乏切身感受。陆游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在躬行。”说的就是一边做、一边思考钻研。研究是为了做,在做的过程中可以深化思考。在美国,许多政府官员是学者出身,在政府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又回到学校继续从事研究。有些学者一面从事教学研究,一面又在政府内担任顾问。在政府任内,实践并检验自己的理论,回到学校或研究机构后,又修正并深化自己的理论。理论和实践两条腿交互前进,互相促进。

困境之五:有了人、有了钱、有了环境、有了机制,还有一条,管理要跟上。管理不善,会造成财力和人力的极大浪费。管理不外乎制定未来发展规划、组织多学科集体攻关,使每位研究人员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才干,并对研究成果的质量加以严格控制。而科研管理最重要的一条,是确立奖优罚劣的制度。对于优秀成果,应敢于给予重奖,对于质量低下甚至是对社会有负面影响的东西应给予必要的惩罚。确认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质量的标准,主要的一是求真,即研究成果必须正确反映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二是求善,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

果应当对社会及个人产生有益的影响;三是求新,创新是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是科学进步的必由之路。目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管理体制在上述几个方面均亟待改进。

那末,面对困境该如何对待呢?

首先必须明确,人文、社会科学于国于民,不可或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若想生存和发展,不外乎抓两件事:一是经济发展,二是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是社会安定的前提,社会安定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人文、社会科学与这两个问题均有直接关系。经济学、管理学就是专门研究如何使经济得以发展、财富得以增长的科学,而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则是探讨研究如何使社会得以安定的科学。人文科学的重要性也不言自明。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人类研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其出发点都是为了人,那么,还有哪一种科学比研究人本身的科学更重要呢?人文、社会科学是研究人(文化方面)和科学的科学,它的目的及作用是提高人的素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与进步。目前我国虽然经济高速增长,但存在的问题仍然是触目惊心的。在社会方面更潜伏着严重的问题:如收入差距开始迅速拉大,利益至上原则开始盛行。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人文、社会科学的参与。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政府的关系,正如自然科学研究与生产厂家的关系。企业家从无数科技发明中根据市场需求和自身最大利益选择项目。产品投放市场取得成功后则给予发明者相应的报酬。政治家同样也要从各派学说中选择一家学说,或兼收并蓄各家之长应用于治理国家,一旦产生良好的实际效果,那么研究者也会得到相应的荣誉和报酬。研究人员和政治家的关系是平等的,是建立在相互需要的基础之上的。政治家需要借助思想家的智慧来使国家更稳定、更进步;思想家则需要通过政治家采纳自己的理论主张来确立自己的地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有“为帝王师”的豪迈口号,但实际上知识分子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伟大。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从来不曾凌驾于帝王之上。但知识分子也不是只能附在统治者皮上的毛。他们的理论主张,既可以用来维护帝王们的统治,也可以成为民众起义反叛的思想武器。

任何国家、任何企业、任何个人在从事某项实践活动时,都会期盼着具体有效的理论指导,以便深入了解和掌握该项实践活动的特征和规则,减少工作上的盲目性,避免由于失误所造成的损失。莎士比亚说:“谁蔑视真理,谁就将付出包括生命在内的惨重代价。”

目前,政府虽然知道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事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也深知人文、社会科学的作用,但国家财力所限,不可能对人文、社会科学较

大地增加投入。在这种状况下,笔者试着提出一些个人看法供各方参考。

首先,任何一个行业都有兴衰沉浮。当一个行业陷入低谷时,它必然要自我调整。调整就是对环境的适应。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首先要大幅度削减研究人员队伍,大幅度削减研究课题数目。这样才能保证优秀人才有充足的科研经费从事最有社会实际价值的课题研究。科学研究,在任何时代,都是极少数人从事的事业,因为一方面人们对精神产品的需求远远赶不上对物质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科学研究也不是谁都能涉足的领域。更何况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无必要也无力量养活大批的研究人员进行低水平的重复研究。那种平均撒胡椒面的做法已被证明是对科研经费的浪费,是对少数有创造才能的杰出人才的极大不公正。只有集中科研经费,使研究人员有充裕的经费,科学研究才能吸引大批青年学子投身其中,也才能产生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并从而提高人文、社会科学在社会上的信誉。我国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虽然有几十万人之多,但是真正具有浓厚的理论兴趣、科研能力、科研水平和实践经验的人其实并不多。理论兴趣是从事科学研究的首要条件。追求真理与追求财富毕竟不同。古往今来,只听过以商求富、以工求富,而未闻以文求富的。因为真理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而不是个别人的私产。经济大潮的冲击,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既是一件坏事,也是一件好事。它虽然冲走了一些有才能的人,却也使一批真正献身于科学事业的人留了下来。

其次,国家应给科学研究以自由。建国以来学术发展的历史证明:学术发展有赖于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各种学派都只能从事实出发,采取平等对话的方式,以理服人。以行政手段压制一派、扶持一派的做法并不能真正解决学术问题,反而对学术发展起破坏作用。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表明,国家干预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的斗争始终存在。但哪一派占上风,则要看其理论在实际生活中所产生的作用而定。在战后资本主义相对繁荣的时期,西方经济学界几乎是凯恩斯主义的一统天下。然而,70年代后期,面对经济滞胀的局面,凯恩斯主义无计可施。于是,新自由主义乘势而起,与凯恩斯主义展开了引人注目的论战。在论战过程中,凯恩斯主义不断吸收新自由主义学派中那些被实践证明是合理的理论观点;而新自由主义各派也并不讳言市场经济的某些缺陷,不完全反对政府干预。由此可见,论战的双方都从论战中得到好处,而最终受益者则是美国政府。学术上的争论,如同市场上的竞争一样,其结果是更高质量的产品、更好地满足社会的要求。

最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产生

一批对社会及其社会成员有积极影响的作品。不管是一篇短文,还是一部鸿篇巨作,它的价值标准只能有一个。所谓积极的影响,是指作品在传播开来以后,能够提高人的科学文化素质和道德伦理修养,能够对现有社会秩序起到稳定作用,并且努力推进到一个更加文明、更加进步的境界。我国的科研管理如同一些国营企业的生产管理一样,处于相当低的水平。据调查,某部委的科研规划,因课题负责人工作较重、课题难度大、经费不足等原因而未完成的占课题总数的将近一半,另有 30% 的课题完成之后因无法解决出版补贴问题而被尘封在抽屉里。在侥幸得以出版的 20% 书籍中,大部分因质量平平而从此消声匿迹。真正有影响,为政府所吸收

采纳的成果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就这样,大笔科研经费掉进了“黑洞”里,却无人对此负责。想当年,卢梭是以一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应征法国弟戎科学院的有奖征文而一举成名的。美国的大部分教授也是以每年出多少本书来确保其教授职位的。我们何不也采取征文的办法,把高昂的研究成本与由此产生的风险交给研究者承担,而非让国家全包下来呢? 这样国家只需要花极少的钱,便可以得到全国有识之士的思想精华,并可以在最大范围内发现贤明人士,通过重奖不但可以补偿获奖者的成本支出,更可以获得巨大的社会收益,并由此极大地提高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地位。

(责任编辑 孙立明)

科技动态

水利学家就北京水危机提出对策

[本刊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子课题“北京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关键问题之一——雨洪利用研究”,在王应楷高工、惠士博教授、钟玉麟高工主持下,联合北京水利科学研究所、清华大学、北京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和水文总站的几十位水利科技工作者,针对北京水资源严重不足的问题开展基础性理论与应用技术的研究,现已全面完成预定任务,不久前通过专家验收。

北京市总面积约 16800 平方公里,近十年来年平均降水量约 525 毫米,天然水资源可利用量仅 35 亿立方米,而全市年实际用水量为 40 亿立方米,水资源严重不足,80 年代以来全市地下水超采量达到 37 亿立方米。预测到 2000 年,全市年平均缺水 6~12 亿立方米,而多年来在汛期内清水白白流失,年平均出境量达 9.5 亿立方米。如何减少径流流失,补充首都用水量的不足,如何“寓资源利用于灾害防范之中”,是一个既有实用价值又有科学意义的研究课题。自 1989 年以来,课题组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1. 对城市水文和雨洪水质首次进行了系统的观测、分析和动态研究,为城市雨洪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2. 在城区雨洪利用方面,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利用屋面径流的渗井试验室,并建立了渗井数学模型;完成了城市绿化草种的耐淹筛选和不同类型城市草坪的土壤水运动的研究;提出了城区雨洪利用对策。
3. 在平原区的农田雨洪利用方面,建立了国内第一个面积为 10 平方公里的雨洪利用示范区,研究了不同井

型(管井、辐射井)自压回灌和河道闸与排水沟蓄水回灌效果;结合田间试验,采用数学模拟方法,对不同质地,不同结构性状土壤进行了降雨入渗研究,提出了不同农田土壤和汛期暴雨组合条件下的降雨入渗规律,为农田雨洪利用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填补了空白。通过研究提出了平原地区雨洪利用对策。

水利专家们在评价课题研究成果时认为,研究工作以机理研究为理论基础,以技术研究为实践手段,系统总结了国外雨洪利用文献资料,用“动态”观点详细分析了水文、水资源势态和雨洪水质的变化规律,并做出可利用性的评价。在土壤水动力学领域内,首次进行了渗井入渗机理的水动力学分析,并用势能理论对农田和绿地降水系统修建雨洪利用节制闸 10 座,新打灌溉回灌两用井 10 眼,已投入使用。

专家们预测,在北京平原区普遍采用雨洪利用工程系统和各闸开始蓄水回灌后,偏丰水年可增加 1 亿立方米以上的地下水回补量。在城区采用分散拦蓄雨洪措施,平水年至偏丰水年可增加综合利用量 0.4~0.6 亿立方米。同时辅以修建屋顶庭院渗井,改造草坪,铺设透水路路面等措施,建筑物密集地区的径流系数可减少 0.2 左右,从而大大减轻了雨水管网的排水压力。若再开发利用官厅山峡及城东的引清回灌,城区的雨洪利用量可达 0.8~1.0 亿立方米,对缓解北京地区的水资源紧缺状况,具有重大作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供稿,责任编辑 刘先曙)